

史語所的語文學傳承及發展*

孔令偉**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於1928年成立，和語文學在近代華文學界的開展可謂息息相關。不僅推進所謂「虜學」之非漢文史料研究，開闢中國史之格局，亦促成華文學界與國際學術的接軌。在諸位先賢的努力下，史語所的語文學一度在1930年代異軍突起，受到國際學界的關注。然其後中日戰爭乃至國共內戰的干擾，最終導致語文學後續發展之受限。通過爬梳史語所檔案，本文回顧史語所早期致力發展語文學及其業績，重點分析其學術成就，以此為將來語文學及中央歐亞研究之可能發展提出學術史參照。

關鍵詞：語文學 歷史語言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 虜學 中央歐亞研究

* 本文寫作與修改過程，幸得所內先進協助。本文初稿宣讀於2023年10月18日「挑戰與新生——歷史語言研究所慶祝九十五周年學術研討會」，承蒙與談人王汎森院士提點。復與李貞德所長、高震寰先生研討，並獲傅斯年圖書館授權運用本所檔案。助理簡瑞瑩、李岱樺曾協助資料整理與文稿校對。敬致謝忱。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一·前言

作為享譽華文世界乃至國際學界之著名人文學研究機構，成立於民國十七年(1928)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在諸多相關研究領域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其學術影響持續迄今。毫無疑問，史語所成立至今九十五年，學術聲望並非一蹴可幾，多賴歷輩先進同仁開創積累，是以回望所史對於當下乃至未來學術之發展，實有必要。與此同時，史語所之學術發展，在近代華文與國際學界之間，扮演著關鍵角色。因此史語所之所史並非單一機構之掌故，而是與近代華文學界乃至世界學林之脈動息息相關。在此脈絡下，史語所早期在語文學(philology)之業績，具有重要學術意義。史語所自成立之初便以語文學為學術核心。在傅斯年(1896-1950)、陳寅恪(1890-1969)等領袖型學人引領下，諸如于道泉(1901-1992)、王靜如(1903-1990)、李方桂(1902-1987)、張琨(1907-2017)、岑仲勉(1885-1961)、陳述(1911-1992)等包含歷史學、文獻學及語言學諸領域之所內先輩，投身研究印度、西藏、西夏、突厥、蒙古、滿洲等多語種材料之緣由。另一方面，藉由通訊與兼任研究員制度，史語所亦與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鋼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 1877-1937)、林藜光(1902-1945)、韓儒林(1903-1983)等精通語文學之學人，建立學術聯繫。此外，史語所不僅重視搜集、刊布一手史料，積極建購海內外出版之語文學有關圖書，尤其重視通過海外深造、移地研究等方式培育語文學研究的青年人才。由是觀之，史語所之建立與發展，始終與世界學術史之脈動息息相關。

史語所多年來重視所史資料之保存與研究。史語所於1950年代搬遷至臺北南港以後，在享有相對穩定學術環境的同時，亦逐步開展所史之學術回顧。如民國五十七年(1968)十月二十二日四十周年所慶紀念會上，李濟發表主席報告回顧創所以來同仁之付出與艱辛。¹民國八十七年(1998)杜正勝與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相對全面地從學術史的角度回顧史語所所史。²民國九十七年(2008)王明珂主編《史語所舊檔文書選輯》，為學界

¹ 李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四十週年紀念會學術講演記錄：主席報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0上(1969)：505-508。

² 杜正勝、王汎森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

進一步認識、運用史語所檔案提供便利。³ 除所方組織之集體工作外，亦不乏所內同仁從思想史、學術史的視野觀照所史相關議題，進行獨立專題研究，如王汎森對傅斯年與近代中國學術思想史之開創研究，⁴ 張谷銘就史語所、語文學及東方學的深入探討，⁵ 孔令偉關注陳寅恪治東方語文學之願景。⁶ 本文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上，運用《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以相關研究領域以及學者生平為經緯，勾稽史語所早期發展語文學之學術理念以及現實發展。本文重點梳理王國維、陳寅恪、傅斯年三人對語文學的倡議，以及史語所設置前後近代華文學界語文學傳統的建立。此外，本文亦就同仁研究以及人才培養等面向，以于道泉為例考察史語所早期語文學研究發展之經歷。在考察所史的同時，分析史語所早期為弘揚語文學所設立之學術目標，進而重構近代華文學界語文學之學術史光譜，以期為將來開展相關研究領域，提供可能的思想參照。

二·語文學的引介

十八世紀以降歐洲的海外探索與殖民擴張，促成西方學界對異文化的關注與研究，逐步形成所謂的東方學 (Oriental studies)。與此同時，源自中世紀歐洲經院傳統、重視古希臘文、拉丁文各語種《聖經》版本比勘的語文學，亦隨著歐洲學界對東方古文字的破譯，獲得長足進步。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西學東漸的背景下，原先佔據晚清學術主流地位的考據學，與源自歐洲的語文學以及東方學之間發生交流，其中羅振玉 (1866-1940) 與王國維 (1877-1927) 可以說是最早一批預得此學術潮流之中國學者。在與法國東方學巨擘伯希和以及日本東洋史學人的交往過程中，羅、王二人已認識到歐洲語文學方法以及非漢文字史料，對於研治中國史具有重大助益。故民國十一年 (1922) 王國維致書馬衡 (1881-1955)，主張中國學術界應推動東方語文學之願景：

³ 王明珂主編，《史語所舊檔文書選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8）。

⁴ 王汎森，《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Wang Fan-Sen,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⁵ 張谷銘，〈Philology 與史語所：陳寅恪、傅斯年與中國的「東方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7.2 (2016)：375-460。

⁶ 孔令偉，〈陳寅恪與東方語文學——兼論內亞史及語文學的未來展望〉，《新史學》31.1 (2020)：53-102。

現在大學是否有滿、蒙、藏文講座？此在我國所不可不設者，其次則東方古國文字學並關緊要。研究生有願研究者，能資遣法、德各國學之甚善，惟須擇史學有根柢者乃可耳。⁷

王國維明確表示中國大學必須積極發展滿洲、蒙古、西藏諸語文之學，並派遣有史學基礎之研究生前往歐洲進修「東方古國文字學」，此即其當時對東方語文學(Oriental philology)之理解。王國維此言大致可分為兩個層次：首先，滿洲、蒙古、西藏不僅作為清朝版圖，傳統上亦被視為所謂四裔而與中國關係密切，故中國學界有發展滿、蒙、藏文研究之必要。其次，王國維亦強調當時歐洲學界破譯之古印度梵文、古伊朗文乃至古埃及象形文等中國學者未能通曉之學術領域，並將其統稱為所謂東方古國文字學。由此顯見，王國維的學術關懷遠邁所謂國故之範疇，其對文獻學、文字學的認知也不囿於甲骨文、金文，而是遠拓至滿、蒙、藏乃至更為廣泛的東方學範疇。

王國維並非當時唯一關注到歐洲語文學發展的中國學人。就在王國維致書馬衡表示發展滿、蒙、藏文研究之學術願景不久後，翌年陳寅恪亦不約而同在給其妹陳新午的信件中自述治學理念，即當時刊載見報後震動中國士林的〈與妹書〉，氏稱：

我所注意者有二，一歷史（唐史西夏⁸），西藏即吐蕃，藏文之關係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經典，印度極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類，與佛教史有關者多，中國所譯，又頗難解。我偶取金剛經對勘一過，其注解自晉唐起至俞曲園止，其間數十百家，誤解不知其數。我以為除印度西域外國人外，中國人則晉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當能得正確之解，其餘多是望文生義，不足道也……又蒙古滿洲回文書，我皆欲得。⁹

從以上自述，可知陳寅恪早年治學聚焦於唐蕃關係史與佛教文獻學，尤重梵、藏比較語文學方法，同時亦關注蒙古、滿洲以及察合臺文等多語種歷史文獻。陳寅恪以語文學為基礎入手史學與佛學的研究取徑，與他早年留學歐陸，師從路得施

⁷ 王國維著，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第15卷，〈致馬衡〉，頁808。

⁸ 按：原文作「西夏」，依上下文意推斷，顯為「西藏」之誤。

⁹ 陳寅恪，《書信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與妹書（節錄）〉，頁1-2。

(Heinrich Lüders, 1869-1943)、弗蘭克 (August Hermann Francke, 1870-1930)、黑尼士 (Erich Haenisch, 1880-1966) 等研究梵文、藏文、蒙古文的東方語文學者，直接相關。¹⁰ 陳寅恪在民國十六年 (1927) 於《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上發表〈《童受喻鬘論》梵文殘本跋〉一文，曾自述其對語文學的關注，實受當時德國學術界之影響：

昔年德意志人於龜茲之西，得貝葉梵文佛教經典甚多，柏林大學路得施教授 Prof. Henrich Lüders 檢之，見其中有《大莊嚴論》殘本。寅恪嘗游普魯士，從教授治東方古文字學，故亦夙聞其事。¹¹

此處陳寅恪提及他師事路得施學習「東方古文字學」之經歷，與王國維對東方語文學的求索，可謂英雄所見略同。同年王國維自沉昆明湖，陳寅恪之所以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中興「許我忘年為氣類」、「風義平生師友間」之感，¹² 不僅在於懷念王國維之道德文章以及私人交誼，亦因二人皆係當時少數預流國際東方語文學之中國學人。故在王國維身後，陳寅恪頗欲繼其遺志，以語文學方法對勘《蒙古源流》多語種版本。¹³ 由此可見，早在二十世紀二〇年代，以王國維與陳寅恪為代表的中國學者，已經開始關注東方語文學對研治中國史的重大學術意義。民國十六年 (1927) 王國維的亡故，象徵中國一代學術的終結；隔年史語所的建立，則代表一個新傳統的開展。王國維與史語所之間，表面上似無直接聯繫，惟二者間對語文學的共同願景，實有思想上之淵源，而陳寅恪正為溝通其間的關鍵人物。

三·史語所工作之旨趣

語文學引入近代中國，始於王國維、陳寅恪等人的治學眼光；惟語文學真正在華文學術界中受到普遍關注，則實有賴傅斯年的倡議以及史語所的建立。相較於陳寅恪，傅斯年本人雖並未專門研究滿、蒙、藏等非漢文字，但廣泛的留學經歷、獨

¹⁰ 陳懷宇，《在西方發現陳寅恪：中國近代人文學的東方學與西學背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頁 60-99。

¹¹ 陳寅恪，〈《童受喻鬘論》梵文殘本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1.3 (1927)：11-13。

¹² 陳寅恪，《詩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王觀堂先生輓詞并序〉，頁 17。

¹³ 孔令偉，〈陳寅恪與東方語文學——兼論內亞史及語文學的未來展望〉，頁 68-69。

到的學術眼光加上過人的行政才幹，使他成為近代中國推動語文學研究的代表人物。相較於王國維、陳寅恪對語文學的理解，多半體現在個人治學與私人通信，傅斯年則通過學術社群以及組織發展，進一步落實語文學之推進，其於民國十七年(1928)創建史語所，影響尤為廣泛深遠。史語所的創立，始終與華文學界乃至國際思潮的脈動緊密相關，並具體體現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下稱〈旨趣〉)。¹⁴ 作為史語所成立的官方宣告，傅斯年於〈旨趣〉一文中從實證史學的立場出發，指出直接研究材料、擴張研究材料以及擴充研究工具之必要性。在論述擴張研究材料之重要性時，傅斯年強調當時歐洲的「虜學」研究超越中國學界之處：

我們中國人多是不會解決史籍上的四裔問題的，丁謙君的諸史外國傳考證，遠不如沙萬君之譯外國傳，玉連之解大唐西域記，高幾耶之注馬哥博羅遊記，米勒之發讀回紇文書，這都不是中國人現在已經辦到的。凡中國人所忽略，如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問題，在歐洲人卻施格外的注意。說句笑話，假如中國學是漢學，為此學者是漢學家，則西洋人治這些匈奴以來的問題豈不是虜學，治這學者豈不是虜學家嗎？然而也許漢學之發達有些地方正借重虜學呢！¹⁵

傅斯年在〈旨趣〉中的這段文字，重在指出傳統中國史學者僅能運用漢文史料，研究視野亦局限在中原域內，往往忽視且無力研究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四裔之學，故在研究材料範圍上遠不如歐洲學者。

與此同時，傅斯年舉出四位當時歐洲東方學者之業績，以資為證，其中「沙萬君之譯外國傳」，即沙畹(E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分別於1905、1907年譯注《魏略·西戎傳》與《後漢書·西域傳》等篇；¹⁶「玉連之解大唐西域記」，指儒蓮(Stanislas Aignan Julien, 1797-1873)法譯《大唐西域記》(*Mémoires sur*

¹⁴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1928)：3-10。關於此文的思想脈絡與史學意義，參：王汎森，〈歷史研究的新視野：重讀《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古今論衡》11(2004)：1-12；黃進興，〈機構的宣言：重讀傅斯年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5：19-28。

¹⁵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頁5。

¹⁶ E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 "Les Pays d'Occident d'après le *Wei-liao*,"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6.5 (1905): 519-571; E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 "Les Pays D'Occident D'Après le *Heou Han chou*,"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8.2 (1907): 149-234.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¹⁷「高幾耶之注馬哥博羅遊記」，謂高迪愛 (Henri Cordier, 1849-1925) 據裕爾 (Henry Yule, 1820-1889)《馬可波羅遊記》英譯本所進行之校注成果；¹⁸至於「米勒之發讀回紇文書」，則指 1902 至 1914 年間勒柯克 (A. von Le Coq, 1860-1930) 等人組織德意志吐魯番考察團所發現，並由繆勒 (Friedrich Wilhelm Karl Müller, 1863-1930) 進行考釋之回鶻文寫本，其中著名者如《彌勒會見記》(*Maitrisimit nom bitig*)。¹⁹傅斯年所列舉以上四位「虜學」學者，均係歐洲東方語文學的研究者，其中儒蓮、高迪愛、沙畹屬於法國漢學一系，至於繆勒則是德國突厥學以及吐魯番研究的奠基者。嚴格來說，「虜學」與「漢學」並非截然對立，儒蓮、高迪愛、沙畹皆以研究古漢文史料而見長，惟其善於從更加寬廣的歐亞視野觀照中國史。為有別於以中原為中心的中國文史典範，傅斯年權以帶有戲稱色彩的「虜學」代指歐洲東方語文學，並在〈旨趣〉一文的結語高呼「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²⁰傅斯年之所以喊出如此激昂的口號，一方面固然有國族主義的背景，另一方面無疑亦受到歐洲東方語文學的學術刺激。民國十八年 (1929) 傅斯年致信陳垣稱：「斯年留旅歐洲之時，觀異國之典型，慚中土之搖落，並漢地之歷史言語材料，亦為西方旅行者竊之奪之，而漢學正統有在巴黎之勢，是若可忍，孰不可忍？」²¹傅斯年之所以欲向巴黎爭奪所謂東方學之正統，主要是因伯希和將包含漢、藏、回鶻、粟特、吐火羅諸等敦煌文書攜回巴黎後，促使法國的東方語文學界在國際學界取得領先地位。

傅斯年本人雖十分關注東方語文學在當時歐洲學界的突飛猛進，亦對東方語文學界之行情有所認識，惟他本人並非該領域之研究專家。史語所研究同仁中真正能躬行實踐所謂虜學者，首推陳寅恪。在加入史語所以前，陳寅恪於民國十七年 (1928) 六月發表〈《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冥報傳》跋〉一文，體現出他當時對東方語文學之掌握：

¹⁷ Hiouen Thsang, *Mé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 trans. M. Stanislas Julien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1857-1858).

¹⁸ Marco Polo,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The Complete Yule-Cordier Edition*, trans. Henry Yule, ed. Henri Cordier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93).

¹⁹ F. W. K. Müller & E. Sieg, "Maitrisimit und 'Tocharisch'," *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16: 395-417.

²⁰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頁 10。

²¹ 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卷 1，〈傅斯年致陳垣〉，頁 190-191。

《金光明經》諸本，予所知者，梵文本之外……西藏文則有三本（見《支那學》第四卷第四號櫻部文鏡《蒙文金光明經斷篇考補箋》），其一為法成重譯之中文義淨本。蒙古文及 Kalmuk 文（予曾鈔一本）均有譯本。滿文大藏經譯自中文當有《金光明經》，但予未得見。突厥系文則有德意志土魯番考察團所獲之殘本（F. W. K. Müller, *Uigurica*, 1908）及俄國科學院《佛教叢書》本。（見前）東伊蘭文亦有殘闕之本，（見 P. Pelliot, *Etudes Linguistiques sur les Documents de la Mission Pelliot*, 1913 及 E. Leumann, *Abhandlungen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XV, 2, 1920）據此諸種文字譯本之數，即知此經於佛教大乘經典中流通為獨廣，以其義主懺悔，最易動人故也。²²

陳寅恪對《金光明經》藏文、蒙古文、回鶻文、粟特文等多語種譯本流通情況的掌握，體現出他密切關注伯希和、繆勒等國際東方語文學者的前沿研究。在國際學術潮流的帶動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立之初，傅斯年便以所長之姿力倡「虜學」，並率先延攬通曉語文學門道的陳寅恪入所，並倚重其研究長才整理北平保存之多語種史料，為此民國十七年（1928）九月傅斯年致陳寅恪信件中稱：

查歷史的、語言的材料聚集北平者至多，整理發明端賴博學如先生者。不揣冒昧，敬煩先生常川住在北平，以便從事整理。聞先生于內閣大庫中頗得重要史料，有意編輯，又得數種文書之蒙古史，思考校之，無任欣佩，頗思早觀厥成，以樹研究史學之表儀。²³

實際上，陳寅恪最初進入史語所的研究方向，並非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國中古史，而是將重點放在以語文學方法梳理內閣大庫檔案與蒙古史料。²⁴

民國十七（1928）至二十六年（1937）陳寅恪任職史語所乃至擔任該所第一組主任期間，他本人勦力以語文學方法推展歷史學研究，除整理史語所以及北平故宮藏清代舊檔外，尤以梵、漢、藏、蒙等多語種佛教文獻比勘，用力為多。陳寅恪的研究特長，體現在結合歷史學關懷及語文學方法，乃至史料上的時代與地理跨度，其中又以圍繞《蒙古源流》（*Erdeni-yin tobči*）一書展開之分析考訂，最為精到。民國十六年（1927）冬，陳寅恪於北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發現《蒙古源流》蒙古文與滿洲

²² 陳寅恪，〈《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冥報傳》跋〉，氏著，《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頁 291。按：原文所引西文書名無斜體。

²³ 《傅斯年遺札》卷 1，〈傅斯年致陳寅恪〉，頁 149。

²⁴ 孔令偉，〈陳寅恪與東方語文學——兼論內亞史及語文學的未來展望〉，頁 67-68。

文本，旋即著手開展研究工作，因此翌年他加入史語所後，考訂《蒙古源流》與藏文《大藏經》遂作為史料學組的重點任務被列入史語所民國十七年度的工作報告當中。²⁵ 陳寅恪曾在民國十八年(1929)致傅斯年的信件中，總結其以東方語文學治多語種佛教文獻之心得：

蓋現在佛經之研究為比較校刊學，以藏文校梵文，而藏文有誤，更進一步以蒙文校之，又核以中文或稍參以中央亞細亞出土之零篇斷簡，始成為完全方法。²⁶

陳寅恪信中所謂比較校刊學，實指語文學擅長之多語種文本比勘，即將同一或相關文本之多語種譯本互相比較，在作成精校本(critical edition)的基礎上，檢視文字異同背後所體現的多元歷史脈絡。

四·陳寅恪的虜學研究

承前所述，陳寅恪在史語所工作的早期階段主要用心於以東方語文學的研究方法及學術視野來推進中國史研究，其中尤以他對《蒙古源流》的系列研究具代表意義，可謂史語所早期發展虜學的定鼎之作。就方法而言，他試圖通過其中關於西藏王統之記載，與《兩唐書》中的〈吐蕃傳〉互校。民國十八年(1929)年初陳寅恪致書傅斯年稱：

弟近日草「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攷」一文，即蒙古源流研究之一，俟寫正後再寄呈求教（因作此書校注至第二卷有與唐書相關者，引用拉薩唐蕃會盟

²⁵ 傅斯年，〈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報告書第一期〉，《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1928年11月30日，元198-1；國立中央研究院文書處，《國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總報告》（收入劉桂雲等選編《國家圖書館藏國立中央研究院史料叢編》第1,2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據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1928年鉛印本影印），頁218。本文徵引中研院報告書，其中史語所提交報告底稿今存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至於民國十七年至三十七年院方總報告，則在1949年後留存大陸，現存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此外，關於1949年前中研院之檔案史料，據稱保存於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者，尚有3,000餘卷；今日南港中研院本部檔案庫房收儲文書年限，則在1957年以後。

²⁶ 陳寅恪，〈陳寅恪致函傅孟真〉，《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某年某月24日，元4-6。

碑之藏文以校正新舊唐書吐蕃傳等也)。²⁷

陳寅恪以語文學方法比對《兩唐書》與《蒙古源流》之治學路數，亦體現在他的教學活動上，如民國十八年(1929)他曾在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唐代西北史料」，該課程簡介稱：「取近年西北發見之史料與舊史互相解釋證明。用書：《舊唐書》、《蒙古源流》。自撰問題研究論文」。²⁸ 陳寅恪此處所分「近年西北發見之史料」以及「舊史」，即以新出文獻與傳世史料互證，與王國維二重證據法可謂異曲同工，在思想淵源上又與歐洲實證史學所強調遺留性 (Überrest) 以及記述性 (Tradition) 之史料批判思想息息相關，前者指非以傳授歷史知識為主要目的、在歷史過程中形成之遺留物，如敦煌遺書、明清檔案；後者則係有意識講述、編纂、塑造歷史的文本，如作為正史之《廿四史》。以陳寅恪〈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攷〉一文思路為例，〈唐蕃會盟碑〉相較於《兩唐書》，前者無疑更接近遺留性史料，後者則當為記述性史料。此外，《蒙古源流》雖為書成於清代，惟其中第二卷所載吐蕃王統有早期藏文史源。故在當時藏文材料取得的限制下，陳寅恪將《蒙古源流》所載吐蕃世系與《兩唐書》中的〈吐蕃傳〉互校，無疑在史源與方法上將唐蕃關係史推向新的高度。

民國十九(1930)至二十(1931)年間，為專心深入對《蒙古源流》之鑽研，欲向清華告假休講一年，故陳寅恪寄信羅家倫，自陳治學心跡：

《蒙古源流》著錄於《四庫書目》，然訛誤極多，幾不可讀。王觀堂先生臨卒前猶勤校此書，然迄未能蒞事。近日既得蒙古文原本，而中國文本系自滿文譯出，又於景陽宮發見滿文本，及蒙文書社新印漢文本，寶瑞臣、王靜安等校本，是治此書之一最好機會，故思以一年之期間為之。²⁹

由此可見，陳寅恪欲繼承王國維校訂《蒙古源流》之遺志，並進一步運用當時北平故宮新見之蒙古文、滿洲文本，與漢文四庫本互校。在前述語文學基礎上，陳寅恪進一步圍繞該文本開展相關滿蒙藏史料的比較研究工作，撰成〈吐蕃彝泰贊普

²⁷ 陳寅恪，〈陳寅恪致函傅孟真〉，《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某年2月9日，元4-3。

²⁸ 王應憲編校，《現代大學史學系概覽(1912-19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上冊，頁317。

²⁹ 羅久芳編，《五四飛鴻：羅家倫珍藏師友書簡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0)，〈陳寅恪致羅家倫等〉，頁118-119。

名號年代攷》、〈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蒙古源流作者世系攷〉以及〈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等四篇《蒙古源流》系列研究，並先後發表於《史語所集刊》。³⁰

陳寅恪在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初聚焦於《蒙古源流》的研究工作，一方面體現史語所早期專注東方語文學的工作旨趣，另一方面亦反映當時華文學界對語文學以及域外史料的求索，對此傅斯年給予陳寅恪高度的學術評價。如傅斯年在北京大學教授「史學方法導論」時曾盛讚陳寅恪〈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攷〉：

我的朋友陳寅恪先生，在漢學上的素養不下錢曉微，更能通習西方古今語言若干種，尤精梵藏經典。近著〈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攷〉一文，以長慶唐蕃會盟碑為根據，「千年舊史之誤書，異國譯音之訛讀，皆賴以訂」。此種異國古文之史料至不多，而能使用此項史料者更屬至少，苟其有之，誠學術中之快事也。³¹

陳寅恪引藏文對音考訂唐朝與吐蕃史的治學視野，亦給傅斯年相當程度的啟發。如傅斯年在閱讀《後漢書集解》時，曾就〈南蠻西南夷列傳〉所謂「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央徒。今長沙武陵蠻是也」，以硃筆進行眉批。傅斯年推測《後漢書》所提到的精父一詞，可能與藏語有關，其謂「今藏語自唐代譯梵典以來之語猶以王作『精夫 rJal PO』，未知與此有關否？」³² 傅斯年雖非唐史與藏學方面的專家，卻能信手拈來藏語中對國王的稱呼，並在個人閱讀《後漢書》的眉批中大膽推測武陵蠻與漢藏語族之關聯，這或在一定程度上曾受到陳寅恪關於吐蕃王統研究的影響。³³

此外，陳寅恪的虜學研究，曾推動史語所圖書館對東方語文學著作的收藏。陳

³⁰ 陳寅恪，〈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1 (1930)：1-5；〈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 (1931)：302-309；〈蒙古源流作者世系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 (1931)：310-311；〈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2 (1930)：125-129。

³¹ 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傅斯年著，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2卷，頁321。

³² 王汎森，邱仲麟主編，《傅斯年眉批題跋輯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20），冊1，頁388。此條史料承王汎森、高震寰先生提示。

³³ 傅斯年此處的對音或可商榷，惟漢藏語古音確實與《後漢書》中對西南夷之記載，確有巧合。如「精夫」一詞，據李方桂上古音系擬為 tsjing pjag，與藏語 bstan po 相近，該詞原意雄強之人，即唐代贊普之藏文詞源。至於「央徒」，上古音還原為 jang dag，在對音及語意上近似藏語 nga dag（吾等）。惟三代兩漢虜語材料稀闕，史不足徵，仍待來者蒐集語料，並排除外來借詞可能，則或可進一步論證漢代武陵蠻與古漢藏語族之關聯。

寅恪於〈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討論蒙古祖源傳說以及王統世系時，曾徵引波斯史家拉施德丁 (Rashīd al-Dīn, 1274-1318) 的《史集》(*Jāmi' al-tawārīkh*) 一書，然囿於當時圖書條件所限，其引文係轉引自洪鈞 (1839-1893) 《元史譯文補證》。³⁴ 惟洪鈞一書所錄《史集》內容，實乃轉譯自俄羅斯東方學者貝勒津 (Ilya Nikolayevich Berezin, 1818-1896) 之俄譯文。³⁵ 故就嚴謹之史源考訂而言，實有必要進一步參考俄文譯文乃至波斯文原文之必要。1931 年〈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登載於《史語所集刊》之後，時任中華民國駐德商務參贊的俞大維 (1897-1993) 曾致信陳寅恪探討此事，並稱可在德國代為抄寫複本。³⁶

有鑒於《史集》一書對其研究之重要性，陳寅恪遂委請俞大維以打字機重錄貝勒津之《史集》譯文。俞大維復將此事轉託時在波恩大學擔任講師的姚從吾 (1894-1970)，姚從吾於是致書陳寅恪說明情況，說明已託精通俄文之德國友人前往柏林國家圖書館代為查找該書。惟該館收藏冊數不全，僅得前兩冊譯文，加上內容多為波斯文、俄文、蒙古文，不使用拉丁文打字機打字。幸得柏林圖書館當時新設照相部，最終由姚從吾申請翻攝該書，並在俞大維協調下由商務部代墊攝影費一百七十五馬克。³⁷

在收到姚從吾翻攝之《史集》俄譯本後，陳寅恪旋將此案告知傅斯年，說明《史集》之於蒙元史研究之價值，並強調所方未來蒐集全本之必要性，其稱：「此書尚有氏族考一部，未全。洪書亦有目無文，想彼時已難得。日人如那珂等似亦未見。然書重要，仍須求之，方足成全書矣。」³⁸ 陳寅恪給傅斯年的這段信件文字，展現出其當時頗費周折取得俄譯本，欲進一步運用洪鈞、那珂通世 (1851-1908) 未能充分參考的《史集》文本。與此同時，陳寅恪並將自德複印而來、當時不易得見的《史集》俄譯本，交付史語所圖書館。考量當時史語所圖書員楊樾亭 (1901-) 不諳俄文，以及將來圖書查找方便，陳寅恪將該書以英文標註為 Rashid-el Din.

³⁴ 陳寅恪，〈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頁 303-305。

³⁵ I. N. Berezin, "Sbornik letopisei: Istoriya Mongolov, sochinenie Rashid ad-Dina," *Trudy Vostochnogo Otdeleniia Imperatorskogo Russkogo Arkheologicheskogo Obshchestva* 5, 7, 13, 15 (St. Petersburg: Tipografiya Imperatorskoy Akademii Nauk, 1858, 1861, 1868, 1888). 洪鈞，〈元史譯文證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³⁶ 俞大維，〈俞大維致六兄函〉，《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某年 3 月 28 日，元 57-1。此檔承王汎森先生提示線索。

³⁷ 劉經富，〈陳寅恪未刊信劄整理箋釋〉，《文史》2012.2：246-247。

³⁸ 劉經富，〈陳寅恪未刊信劄整理箋釋〉，頁 245-246。

History of the Mongols Persian Text and Translated into Russian by I. Beregin St. Peterburg，並送交楊樾亭以資編目。³⁹ 由此可見，陳寅恪的研究興趣以及學術網絡，曾促成史語所圖書館對東方語文學相關書籍的收藏。

隨著陳寅恪個人研究成果的推進，史語所亦得在東方語文學領域上嶄露頭角，逐漸受到國際學人矚目。在陳寅恪之後，黑尼士亦根據北平故宮滿文本《蒙古源流》進行譯注工作。⁴⁰ 此外，〈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攷〉一文亦受到日本東洋史學界的關注，如 1934 年鴛淵一在回顧其岳父內藤湖南 (1866-1934) 的紀念文章中，一方面認同陳寅恪對《蒙古源流》版本流傳的觀點，即四庫漢文本係根據滿文譯本而非蒙文本翻譯而來；但另一方面，鴛淵一亦強調內藤湖南所代表之日本學界早在 1905、1906 年間便已在盛京發現《蒙古源流》蒙、滿文本並認識版本關係。⁴¹ 誠然內藤發現盛京本《蒙古源流》事在清朝覆亡之前，惟平心而論，陳寅恪據《蒙古源流》所進行之語文學研究，其史學意義遠超過單純的版本討論。如將鴛淵一對陳寅恪的評價放置在當時中、日學術關係史脈絡中，便不難理解史語所的異軍突起，與當時日本滿蒙學之間具有一定的競爭關係。⁴²

五·語文學人才之培育

在陳寅恪個人的研究成果外，史語所早年亦重視語文學相關人才之培育，其中尤以後來被視為「中國藏學之父」的于道泉，具有代表性。于道泉為山東淄博人，早年就讀齊魯大學，修習西洋史、社會學等科目。于道泉自青年時期廣泛接觸印、藏、蒙知識人，從而開拓其文化關懷與學術視野。民國十三年 (1924) 印度詩人泰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 訪華期間曾為其擔任翻譯，爾後又於北京從語文學者鋼和泰習梵、藏文。民國十四年 (1925) 起長住雍和宮約兩年，向喇嘛學習藏、蒙文。復經時任北海圖書館（即北平圖書館前身）副館長袁同禮 (1895-1965)

³⁹ 劉經富，〈陳寅恪未刊信劄整理箋釋〉，頁 250。

⁴⁰ Erich Haenisch, *Monggo han sai da sekiyen: die Mandschufassung von Secen Sagang's Mongolischer geschichte* (Leipzig: Verlag Asia Major G.m.b.H., 1933).

⁴¹ 鴛淵一，〈北平奉天故宮所藏の蒙古源流に就いて—併せて故内藤博士遺業の一斑に就いて—〉，《史林》19.4 (1934)：738-755。

⁴² 孔令偉，〈陳寅恪與東方語文學——兼論內亞史及語文學的未來展望〉，頁 74-75。

孔令偉

推薦入該館協助藏、蒙文圖書搜集與編目，並兼習滿文。⁴³ 于道泉當時在北海圖書館僅為兼職，且年資尚淺，惟因其在藏、蒙、滿諸語文獻上之長才，頗受陳寅恪之賞識與關照。民國十八年(1929)陳寅恪在給傅斯年的通信中，極力推崇于道泉加入史語所，其稱：

于君甚精藏語，又兼治蒙文，實不可多得之人才。現在北海圖書館，月僅三十元，甚不敷用；前年弟每月借錢與之，他時歷史語言北平分所中似可以用，此人斷不至為羊公不舞之鶴，請放心用。⁴⁴

在陳寅恪的推薦下，于道泉順利入所擔任助理員，並主要在北平協助陳寅恪整理滿、蒙、藏多語種史料。于道泉在所約六年，期間積極偕同陳寅恪編纂藏文書目以及地名索引，核對北平故宮藏《滿文老檔》(即無圈點字檔)與漢文史料之外。此外，于道泉亦積極聘請包南結喇嘛(Borjigin Namjal, ?-1933)教授蒙藏語文，商請李永年(1915-1980)編纂藏文詞典。⁴⁵ 更重要的是，于道泉在傅斯年的再三督促之下，由趙元任(1892-1982)協助記音採集，完成《第六代達賴喇嘛倉洋嘉錯情歌》的漢、英譯工作，並在民國十九年(1930)出版，名列史語所單刊甲種之五。⁴⁶

于道泉來所後的工作表現與學術潛力，受到傅斯年的肯定，遂有以所方名義推薦其赴法國深造之舉。民國二十一年(1932)傅斯年函時任中研院總幹事楊銓，以「國家設置中央研究院，其第一要義似乎即為培植專門人才，以求後來有所貢獻于國家」為由，希望推薦史語所三位助理員出國進修，其中于道泉名列首位。⁴⁷ 傅斯年極力向院方推薦于道泉，以冀為史語所培養語文學人才，其函稱：

于道泉君藏文精通，藏語純熟，蒙藏會必無如此人才也。他本山東籍，此次巴黎之Musée de Guimet之主任Hackin君到北平，以Lessing君之介紹，于君往晤之，談談巴黎有機會去否。Hackin謂弟云，他很願意約于君去，但本所

⁴³ 王堯編，《平凡而偉大的學者：于道泉》(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307-318。

⁴⁴ 陳寅恪，〈陳寅恪致函傅斯年〉，《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某年某月24日，元4-6。繫年據陳寅恪，《書信集》，頁23。

⁴⁵ 孔令偉，〈陳寅恪與東方語文學——兼論內亞史及語文學的未來展望〉，頁77-79。

⁴⁶ 于道泉編注，趙元任記音，《第六代達賴喇嘛倉洋嘉錯情歌》(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0)。此書付梓逾半世紀後，于道泉曾回憶自述研究經過，以及期間傅斯年、陳寅恪、趙元任等史語所同仁的影響：于道泉，〈序言〉，收入黃灝、吳碧云編，《倉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資料匯編)》(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頁5-16。

⁴⁷ 《傅斯年遺札》卷1，〈傅斯年致楊銓〉，頁427。

能擔任「一任」否? (a little) 弟當時惟欲助成其事，直應曰「可以」。或者他覺得弟回答太痛快了，遂曰：「我們彼此出一半，如何？」弟答以商量商量看。弟意，外國的錢亦不可多用，須為于君保留自己用功之時間……研究所出甚少之費（原薪之外加一百元，旅費四分之一僅數百元耳），而深深造就一個人才，實是佳事。且于君專門藏語佛典，以後必有供獻于本院也。⁴⁸

關於于道泉留學歐洲的緣起，與當時執掌吉美博物館的考古學者哈金 (Joseph Hackin, 1886-1941) 訪華有關。由於于道泉與曾留學北京、研究雍和宮的蒙古學家雷興 (Ferdinand Lessing, 1882-1961) 相善，在後者的引介下，于道泉遂得在北平與哈金會面。哈金本人曾在阿富汗進行田野工作，係中亞研究之專家，對於道泉在藏學領域的研究專長亦頗為肯定，並願意邀請于道泉赴法進修。在此機緣下，傅斯年極力促成于道泉前往巴黎留學一事，一方面是為實現〈旨趣〉之學術願景，將東方學的正統帶回中國；與此同時，亦在有意無意之間，呼應民國十一年 (1922) 〈王國維致書馬衡書〉中派遣留學生學習東方語文學之遺志。此外，傅斯年與院方以及法方議定，于道泉出國至少一年，以兩年為限。傅斯年對於道泉出國一事，可謂極為關照。于道泉在所任助理員，月薪僅一百元，然在傅斯年的斡旋下，其留學期間史語所除每月補助兩百元，並由北平圖書館額外提供月津貼六十月，外加法方每月資助一千五百元法郎。相較於其他院內同仁，于道泉留學期間之補助不可不謂優渥，傅斯年非但不以為意，甚至向院內主張所方「出甚少之費」，「而深深造就一個人才，實是佳事」，這也體現傅斯年講求拔尖主義的學術眼光。

于道泉民國二十三年 (1934) 離所留學以前，曾在民國二十二年 (1933) 向傅斯年總結手邊研究工作，並根據當下進度分為三類。第一類，已完成工作三項：西藏民間故事四則與漢英譯文、梵語燈譯文、宗喀巴上永樂皇帝書。第二類，出國前可完成之工作兩項：《大藏全咒》目錄及索引、蒙文《大慈法王傳》及譯文。第三類，帶往法國之工作三項：《翻譯名義集》之藏文及漢文索引、《西域同文志》之滿蒙藏文索引、藏文典籍目錄。⁴⁹ 這份工作摘要，體現于道泉當時龐大的學術企圖，惟最後真正付梓之個人研究，唯「宗喀巴上永樂皇帝書」一篇，即收錄於民國二十四年 (1935) 刊行之《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之〈譯注明成祖遣使召宗喀

⁴⁸ 《傅斯年遺札》卷1，〈傅斯年致楊銓〉，頁428-429。

⁴⁹ 于道泉，〈于道泉致函傅孟真〉，《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無年月，元62-1。

巴紀事及宗喀巴覆成祖書》，⁵⁰ 成為明代漢藏關係史的經典之作。爾後由於各種時代限制，于道泉離開史語所後，並未能將上開其餘研究計畫完成付梓。

除個人研究工作外，于道泉離所前最為關心者，莫過於所內蒙藏語文的教學傳承，其中主要涉及包南結與李永年二人。于道泉在進入史語所前，曾在雍和宮學習蒙藏文，故民國十八年(1929)陳寅恪推薦于道泉入所時，向傅斯年稱「彼現與喇刺(按：原文筆誤，當作喇嘛)往來至繁，於蒙藏音韻語言之學，極有興趣，必可造之材」。⁵¹ 在于道泉入所後，曾引介一位名為包南結的蒙古喇嘛，在史語所兼職擔任蒙藏文顧問。這位蒙古喇嘛不僅在所內傳授蒙藏文知識，甚至曾同于道泉共同在戰時肩負保護文獻的關鍵任務。

民國二十年(1931)九一八事變爆發，在日本帝國劍指東北亞的戰略趨勢下，矢野仁一(1872-1970)、白鳥庫吉(1865-1942)等部分日本東洋史學者，將「滿蒙」與「中國」分別建構為一組對立之地緣政治與族群文化概念。在學術報國思想的影響下，傅斯年組織史語所同仁編修《東北史綱》，並親自撰寫第一卷，試圖批駁當時日本學界的「滿蒙非中國論」。⁵² 除書面上的論戰之外，史語所亦積極在搜集滿蒙史料上與日本東洋史學界競爭。乾隆三十八(1773)至五十五年(1790)間，在清廷主導下，以漢文《大藏經》部分為底本，兼參蒙、藏文《大藏經》，譯成《清文全藏經》(即俗稱滿文《大藏經》)並刊刻數部，並藏於承德外八廟之殊像寺以及盛京之北塔法輪寺。⁵³ 由於佛教學者高楠順次郎(1866-1945)的提議，早在1906年日本關東軍便已將清廷存於盛京的滿文《大藏經》攜回日本本土，存放於東京大學，後於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中燒失，此後日本學界試圖再次從中國取得其他滿文《大藏經》文本。⁵⁴

⁵⁰ 于道泉，〈譯注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紀事及宗喀巴覆成祖書〉，《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5)，下冊，頁939-966。

⁵¹ 陳寅恪，〈陳寅恪致函傅斯年〉，《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某年某月2日，元4-6。繫年據陳寅恪，《書信集》，頁27-28。

⁵² 傅斯年，《東北史綱》，傅斯年著，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二卷》，頁376。

⁵³ 孔令偉，〈《金剛經》滿文譯本初探：論滿洲本位政策與清代譯經事業〉，沈衛榮編，《文本中的歷史：藏傳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傳播》(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2)，頁455-496；馮術東，〈殊像寺與滿文大藏經〉，《文物春秋》2005.1：41-43。

⁵⁴ 中見立夫，〈《滿文大藏經》的探索、考證及其復刊〉，故宮博物院、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故宮博物院八十華誕暨國際清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頁523-530。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初熱河戰役爆發，在戰事吃緊之際，于道泉奉派偕同包南結前往承德殊像寺，試圖為史語所秘密取回滿文《大藏經》以資研究，惟當時佔據熱河的奉系軍閥湯玉麟(1871-1949)因對日本以及滿洲國勢力態度搖擺，一度使得于道泉與包南結幾乎難以脫身，爾後北平圖書館派出謝國禎(1901-1982)經大連、瀋陽前往承德營救，二人方得幸免。⁵⁵惟迫於現實無奈，史語所未能成功取回滿文《大藏經》。隨著日本關東軍佔領熱河，該部舊藏承德殊像寺的滿文《大藏經》，也為水野梅曉(1877-1949)、多田等觀(1890-1967)等人所見，從而促使日本學界、佛教界對滿文藏經形成更加深入之認識。⁵⁶

經歷「承德取經」的共患難，于道泉愈加看重包南結喇嘛對史語所之貢獻。故在出國留學以前，曾於民國二十二年(1933)向傅斯年提及包南結於所中後續工作以及待遇問題。⁵⁷在試圖為史語所挽留包南結喇嘛的同時，于道泉亦積極向傅斯年推薦年僅十九歲的李永年。李永年雖無大學文憑，惟因其父為藏藥商人，故對西藏文化產生興趣。于道泉因此向傅斯年推薦李永年「因為欲知西藏藥名故致力於藏文研究，道泉希望給此人名義擔負其生活費，使從包結喇嘛學習蒙藏文」。⁵⁸于道泉此舉主要是希望即便在其赴法國留學以後，史語所內部仍能保持蒙藏語文之傳習以及相關人才之培育，惟結果不盡如人意。在于道泉提出此案不久，包南結喇嘛旋患傷風，肺囊破裂，不久病逝。⁵⁹

根據于道泉的建議，傅斯年同意資助李永年留所學習，作為將來語文學之儲備人才，待于道泉留學兩年期滿歸建後，李永年可擔任其助手。未料民國二十五年(1936)于道泉約定留學期滿之際，希望能繼續留在法國進修藏語、土耳其語以及邊疆史地等知識。由於傅斯年認為于道泉頗有才能，故向曾任教育部次長的錢昌照

⁵⁵ 《傅斯年遺札》卷2，〈傅斯年致蔡元培〉，頁633-634。

⁵⁶ 中見立夫，〈《滿文大藏經》的探索、考證及其復刊〉，頁523-530。

⁵⁷ 于道泉，〈于道泉致函傅孟真〉，《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1933年6月6日，元62-7。

⁵⁸ 于道泉，〈于道泉致函傅孟真〉，《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1933年6月6日，元62-7。

⁵⁹ 于道泉，〈于道泉致函傅孟真〉，《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1933年7月6日，元62-10；于道泉，〈于道泉致函傅孟真〉，《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1933年7月10日，元62-11。

孔令偉

(1899-1988) 擔保，希望能為于道泉延展留學期限一年。⁶⁰ 另一方面，傅斯年亦致信于道泉，表達同意其繼續留法一年，但應寄送研究結果報告，並最遲在民國二十六年 (1937) 七月返所工作。⁶¹ 由於于道泉延期歸國，為此傅斯年曾關切李永年之工作狀況，令其自學蒙藏文，並徵詢羅常培之意見。⁶² 然而于道泉此後依舊沒有依約歸國返所，故李永年之處境愈發尷尬。不僅如此，于道泉隨後因學習興趣廣博，希望更改留學計畫，從法國轉往德國，使得傅斯年對此感到不滿。⁶³ 此後于道泉長期滯留歐洲，遲遲不願返所述職。另一方面，于道泉留學歐洲期間在政治思想上進一步左傾，與中國共產黨人私下過從甚密，因此對傅斯年與國民政府心生抵觸。不僅如此，李永年不幸罹患精神疾病，于道泉對此認為係傅斯年打壓所致。⁶⁴ 由於上述種種複雜原因，最終導致民國三十三年 (1944) 于道泉寄信與傅斯年正式決裂，爾後再未返所。⁶⁵

六·結語

自民國十七年 (1928) 史語所建立到民國二十六年 (1937) 中日戰爭爆發這段不到十年的歲月間，在傅斯年、陳寅恪的號召下，史語所同仁在滿、蒙、藏諸語文獻上，取得令國際學界矚目的研究成果，如陳寅恪關於《蒙古源流》的系列研究，不僅成就個人之學術地位，同時亦弘揚史語所的國際聲望。不僅如此，陳寅恪亦積極建議傅斯年培養專攻蒙藏文獻之人才，于道泉由是進入該所擔任助理員，完成《第六代達賴喇嘛倉洋嘉錯情歌》具有開創意義之翻譯工作，並得以寬裕條件留學歐洲。陳寅恪的治學旨趣以及育才眼光，使得史語所在近世中國與內陸亞洲佛教研究方面異軍突起，一度引起國際學界的關注。不幸的是，中日戰爭的爆發，使得陳寅恪意外喪失《蒙古源流》等相關研究資料，對其學術發展造成嚴重打擊，不得不轉

⁶⁰ 傅斯年，〈傅斯年致函錢乙藜〉，《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1936年2月10日，頁62-19。

⁶¹ 《傅斯年遺札》卷2，〈傅斯年致于道泉〉，頁726-727。

⁶² 《傅斯年遺札》卷2，〈傅斯年致羅常培〉，頁814-816。

⁶³ 《傅斯年遺札》卷2，〈傅斯年致于道泉〉，頁792-793。

⁶⁴ 于道泉，〈于道泉致函傅孟真〉，《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1944年1月24日，頁14-24-4。

⁶⁵ 孔令偉，〈陳寅恪與東方語文學——兼論內亞史及語文學的未來展望〉，頁85-87。

向「限於禹域以內」的中國中古史研究，而不再以「塞表殊族之史事」為主要關懷。⁶⁶ 另一方面，包南結喇嘛因病圓寂，乃至後來傅斯年和于道泉、李永年等人關係的破裂，使得史語所培育語文學人才的努力，受到相當程度的阻礙。外部環境的干擾，加上發展東方語文學所需之人才、圖書，門檻標準甚高，最終造成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初期在華文學界一度鵲起的語文學研究，逐步走向沉寂。

二十世紀五〇年代史語所遷臺以後，仍有個別研究同仁自身從事東方語文學之相關研究，例如陳慶隆 (1939-2022) 考突厥史，李學智 (1919-2003) 整理滿文檔案，卓鴻澤治多語文獻，均有相當貢獻。另一方面，關於語文學的集體研究的推展，尤其是研究人才之培育、圖書資源之建購與跨學科之合作，仍有長足的發展空間。歷史未必循環，但可能押韻，史語所早期在陳寅恪、傅斯年推動下的語文學成就，乃至于道泉、李永年的研究經歷，或能對未來語文學、中央歐亞研究之開展，提供學術史上的參照。

⁶⁶ 孔令偉，〈陳寅恪與東方語文學——兼論內亞史及語文學的未來展望〉，頁 84。

引用書目

一、檔案材料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國立中央研究院文書處編輯，《國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總報告》，收入劉桂雲等選編，《國家圖書館藏國立中央研究院史料叢編》第 1, 2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據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 1928 年鉛印本影印。

二、近人論著

于道泉

- 1935 〈譯注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紀事及宗喀巴覆成祖書〉，《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 939-966。

于道泉編注，趙元任記音

- 1930 《第六代達賴喇嘛倉洋嘉錯情歌》，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中見立夫

- 2006 〈《滿文大藏經》的探索、考證及其復刊〉，故宮博物院、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故宮博物院八十華誕暨國際清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頁 523-530。

孔令偉

- 2012 〈《金剛經》滿文譯本初探：論滿洲本位政策與清代譯經事業〉，沈衛榮編，《文本中的歷史：藏傳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傳播》，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頁 455-496。
- 2020 〈陳寅恪與東方語文學——兼論內亞史及語文學的未來展望〉，《新史學》31.1：53-102。

王汎森

2004 〈歷史研究的新視野：重讀《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古今論衡》11：1-12。

2013 《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王汎森、邱仲麟主編

2020 《傅斯年眉批題跋輯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

2011 《傅斯年遺札》，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王明珂主編

2018 《史語所舊檔文書選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王國維著，謝維揚、房鑫亮主編

2009 《王國維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王堯編

2001 《平凡而偉大的學者：于道泉》，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王應憲編校

2016 《現代大學史學系概覽(1912-19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濟

196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四十週年紀念會學術講演記錄：主席報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0上：505-508。

杜正勝、王汎森編

1998 《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週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張谷銘

2016 〈Philology 與史語所：陳寅恪、傅斯年與中國的「東方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7.2：375-460。

陳寅恪

1927 〈《童受喻鬢論》梵文殘本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1.3：11-13。

孔令偉

- 1930a 〈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2：125-129。
- 1930b 〈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1：1-5。
- 1931a 〈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302-309。
- 1931b 〈蒙古源流作者世系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310-311。
- 2001 〈《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冥報傳》跋〉，氏著，《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頁290-292。
- 2011 《書信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2015 《詩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傅斯年

- 1928 〈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3-10。
- 2001 《東北史綱》，傅斯年著，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二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頁371-498。

馮術東

- 2005 〈殊像寺與滿文大藏經〉，《文物春秋》2005.1：41-43。

黃進興

- 2017 〈機構的宣言：重讀傅斯年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5：19-28。

黃灝、吳碧云編

- 1985 《倉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資料匯編）》，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劉經富

- 2012 〈陳寅恪未刊信笥整理箋釋〉，《文史》2012.2：229-255。

鴛淵一

- 1934 〈北平奉天故宮所藏の蒙古源流に就いて—併せて故内藤博士遺業の一斑に就いて—〉，《史林》19.4：738-755。

羅久芳編

2010 《五四飛鴻：羅家倫珍藏師友書簡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Berezin, I. N.

1858, 1861, 1868, 1888 “Sbornik letopisei: Istoriya Mongolov, sochinenie Rashid ad-Dina.” *Trudy Vostochnogo Otdeleniia Imperatorskogo Russkogo Arkheologicheskogo Obshchestva* 5, 7, 13, 15. St. Petersburg: Tipografiya Imperatorskoy Akademii Nauk.

Chavannes, Emmanuel-édouard

1905 “Les Pays d’Occident d’après le *Wei-liao*.”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6.5: 519-571.

1907 “Les Pays D’Occident D’Après le *Heou Han chou*.”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8.2: 149-234.

Haenisch, Erich

1933 *Monggo han sai da sekiyen: die Mandschufassung von Secen Sagang’s Mongolischer geschichte*. Leipzig: Verlag Asia Major G.m.b.H.

Hiouen Thsang

1857-1858 *Mé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 Translated by M. Stanislas Julien.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Müller, F. W. K. & Sieg, E.

1916 “Maitrisimit und ‘Tocharisch’.” *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395-417.

Polo, Marco

1993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The Complete Yule-Cordier Edition*. Translated by Henry Yule, edited by Henri Cordier.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Wang, Fan-Sen (王汎森)

2000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